

王瓘藏高句骊故城刻石拓片考略*

王飞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北京, 100710)

王瓘藏高句骊故城刻石拓片为国内少见的关于高句丽平壤城刻石的拓片(图一), 拓片见于仲威先生新作《纸上金石——小品善拓过眼录》^[1], 现藏于上海图书馆。目前为止平壤城发现的类似刻石一共六件, 统称为高句丽(高句丽亦作高句骊)平壤城刻石。仲威先生释文为: 己酉年□月廿一日, 自此下向东十二里物省小兄非须白头□□矣。对照拓片和其他几件高句丽平壤城刻石, 这件拓片应为平壤城第二刻石拓片, 完整铭文应为: 己酉年三月廿一日自此下向东十二里物苟小兄俳须百头作节矣。

其他五石铭文^[2]分别为, 第一石铭文: 己丑年五月廿八日始役西向十一里小兄相夫若侔利造作。第三石铭文: 己丑年三月廿一日自此下向□下十二里内卍百头上位使尔丈作节矣。第四石铭文: 丙戌十二月中汉城下后卍小兄文达节自此西北行涉之。第



图一 王瓘藏平壤城刻石拓片(第二石)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 2017 年度研究专项(17VGB002)、国家社科基金 2016 年度重大课题(16ZDA149)阶段性成果。

五石铭文：卦姿盖切小兄加群自此东回上里四尺治。第六石铭文：本城四十二年毕役。其中第一石、第三石和第六石原石已经亡佚，第二石残片现藏于韩国梨花女子大学博物馆，第四石现藏于朝鲜中央历史博物馆，第五石仍砌于平壤城墙中。

一、拓片题记及相关人物

拓片右侧和左侧分别有题跋和观款各一条，右侧为王瓘题跋，共计五列，最右一列，字体稍大，隶书题写：高句骊故城刻石。其余四列字体较小，为楷书题写，从右至左为：张君仰山得自三韩吴亦梅 / 转以赠余光绪二十九年 / 八月初四日王瓘补记藏之 / 篋中已三十年矣。以下有两方篆书印，分别为“王瓘之印”（白文）和“孝玉”（朱文）。左侧为魏馥楷书题写的观款一条，内容为：光绪丙午四月十五日日本速水一孔定海方若山阴魏馥观。下有篆书印一枚，为“魏馥长寿”（白文），观款右侧有篆书印一枚“仰山审定”（朱文）。以上四枚印章均为方形。

拓片上右侧题跋虽短，但说明了拓本的来源及王瓘得到拓本的机缘和时间。王瓘（1847～？年）字孝玉或孝禹，清末民初金石学家、书画家。光绪时期以金石收藏、书法名动一时，官至江苏道员。由于曾为端方幕僚，所见所闻、结交人物颇广。张君仰山即张仰山，浙江人，因经营松竹斋南纸店而闻名京城，松竹斋即荣宝斋的前身，创建于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当时松竹斋的经营范围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官折官卷用纸；二是文房用具；三是代理订购书画作品。吴亦梅即吴庆锡（1831～1879年），祖籍海州（今朝鲜黄海南道首府），生于汉城（今韩国首尔市），字元柜，初号镇斋、又号亦梅、天竹斋，朝鲜时代著名金石学家，译官，思想家，著有《三韩金石录》《三韩访碑录》《天竹斋札录》等。

根据王瓘的题跋，拓片最初是由张仰山从吴庆锡处得到，后来由张仰山转赠给王瓘，王瓘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补记时，这张拓片已经在书篋中收藏30年，以此推测王瓘可能是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从张仰山处得到这张拓片，时年王瓘26岁。

左侧观款由魏馥题写，时间为光绪丙午，即1906年，应是魏馥等人观看王瓘藏平壤城刻石拓片时题写，人物包括日本的速水一孔、定海的方若以及山阴的魏馥。其中速水一孔（？～1941年），日本外务省人员，曾求学于日本明治时代著名诗人北条鸥所，1897年在日本驻杭州领事馆任职，以后相继任日本驻辽阳、奉天、间岛领事馆的副领事或代领事，1917年任日本驻辽阳领事馆领事。1926年出版了《支那の硯に就て》。魏馥（1860～1927年），初名龙常，字纫芝，又字铁珊，亦作铁三，因善书《龙藏寺碑》，号龙藏居士，晚号匏公。光绪十一年（1885年）进士，候补知府。生于浙江山阴县（今浙江省绍兴市），工书法，尤擅魏碑，又因魏氏尚武，人称“精武书家”。

方若（1869～1955年），本名城，字楚卿，小名偈宝，又字药雨，号劬园，晚号古币富翁。浙江定海人，好收藏古泉、碑拓，尤以古泉为最，曾与杭州古泉藏家张叔驯，

重庆古泉藏家罗伯昭鼎峙而立，时称北方，南张，西蜀罗，著有《校碑随笔》等。方氏早年曾因抨击慈禧弊政，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遭通缉而出走日本，天津沦陷时期曾出任伪职。

金石学形成于北宋时期，金石拓片作为中国古代文人研习古物、陶冶情趣的一个特殊载体，在传承古代文明的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收藏金石拓片也成为古代文人的一种风雅，相互观摩、馈赠各自收藏的金石拓片、题跋稽考成为这一活动的重要环节。王瓘藏高句骊故城刻石拓片上的两则题记，一为王瓘自己观摩时题写的关于拓片流传过程、得到机缘和时间的题跋，二是同好魏馥、方若等观摩时题写的观款。

二、高句骊平壤城刻石的发现及其与平壤城的修建

平壤城刻石自发现以来，就成为中国、朝鲜半岛及日本学者关注的对象，关于平壤城刻石发现过程、传承及初步研究，吴庆锡《三韩金石录》、刘喜海《海东金石苑》^[3]等均有记载。吴庆锡本人曾经收藏平壤城刻石第二石，吴庆锡之子吴世昌在平壤城刻石第二石墨拓本和双钩本的题跋^[4]对于上述过程记述的比较详细。鉴于这两种题跋的重要性，我们将其抄录如下。

高句骊故城刻字（墨拓本）题跋（图二）：平壤志曰纯庙己丑大涨九层城溃决出二志石 / 一石有己丑年三月廿一日自此下向东十二里物苟小兄 / 徘徊百头腓节矣二十七字一石有己丑年三月 / 廿一日自此下向东下二里内中百头上位使尔伐节 / 矣二十七字此石出于乙丑为神异云金秋史正 / 喜尝以拓本寄中国刘燕庭喜海曰小兄二字 / 为句骊古迹无疑己丑当为长寿王时燕庭乃 / 载之于海东金石苑此其第一石也越二十六年乙卯 / 先府君获之详加审定以藏之暇或拓以赠人顷 / 岁不肖潦倒政海抛家远遁者屡矣家人不戒 / 误落斯石故第二行之三月廿一日字粉碎日字 / 但存半形可胜惜哉朝鲜金石总览官辑之 / 时赠以拓本矣其书成乃载其年代曰平原王十一 / 年云云未知何所据也先府君所著三韩金石 / 录首载此刻其略曰盖句骊之都平壤自东川 / 王始其后或居或徙其修筑城堞之见于史者 / 东川王以汉延熹十年丁卯筑平壤城始都焉故 / 国原王以晋咸和九年甲午增筑平壤城皆与己丑 / 无涉则此刻当在长寿王时特逸于史耳己丑 / 即长寿王三十六年当中国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 / 魏太平真君十年也其字画因石之势随意横斜 / 每到下段字渐大而起笔出波间具隶法于此亦 / 足以见六朝变隶之笔矣平壤志以俳为俳以 / 作为腓为伐皆误九层城未知何处也 / 长寿王己丑后一千四百七十五年之阙逢困敦 / 葦沧居士识。

这件拓片及题跋上有印章五枚，其中椭圆形“长寿石轩”印（白文）位于拓片右下方，长方形“青城旧物”印（朱文）位于拓片的铭文裂缝间，苹果形“蝉橘”印（朱文）位于题跋右侧中间，方形“吴世昌所藏”印（白文）和方形“吴世昌手拓金石”印（朱文）位于题跋左侧。而双钩本题跋上没有钤印。

高句骊故城刻字（双钩本）题跋：己丑年三月廿一日自此向东十二里 / 物苟小兄俳



图二 吴世昌藏平壤城刻石第二石拓本及题跋

须百头作节矣 / 右廿七字石刻出于纯祖廿九年 / 九叠城涨决处事载平壤志 / 先君子曾访得此石于箕城乌滩 / 江湮按其辞而稽之盖长寿王 / 三十六年筑城时所刻也其字 / 画因石之势随意横斜 / 每至下段字渐大而起笔出 / 波间具隶法古意有余其同 / 出一石亦有文曰己丑年三月廿 / 一日自此向东下二里内中百头 / 上位使尔作节矣廿七字此石出于 / 纯祖廿九年己丑为神异云 / 梨花室

根据吴世昌的两则题跋可知，1828年（戊子年，朝鲜纯祖29年）由于江水大涨，九叠城（即平壤外城）城墙塌毁，发现两块“己丑”铭刻字城石（实际上根据拓片和相关记载，吴世昌题跋中所说第一石的“己丑”应为“己酉”），这件事在当时被视为“神异”。26年后的乙卯年（1855年）吴庆锡在平壤城访的其中一石（平壤城刻石第二石）并将其收藏，闲暇之余详加考证并制作拓片送给同好。吴庆锡首先将其著录在

《三韩金石录》中并考证己丑年为长寿王三十六年。不久吴家因家庭变故保存不善，第二行的“三月廿一日”字粉碎。期间吴庆锡好友金正喜曾经制作拓片赠送给清朝金石学家刘喜海，刘喜海将之著录在《海东金石苑》中。金正喜认为刻石有“小兄”二字应为高句丽遗物，铭文中“己丑”年为长寿王时期。后来《朝鲜金石总览》编辑时吴世昌曾经赠送拓片，书中认为刻石年代为高句丽平原王十一年（569年）^[5]。平壤城第二刻石后为吴庆锡之子吴世昌收藏，1965年10月25日韩国梨花女子大学博物馆以10万元（韩币）购得，博物馆编号为2475号，被指定为韩国宝物642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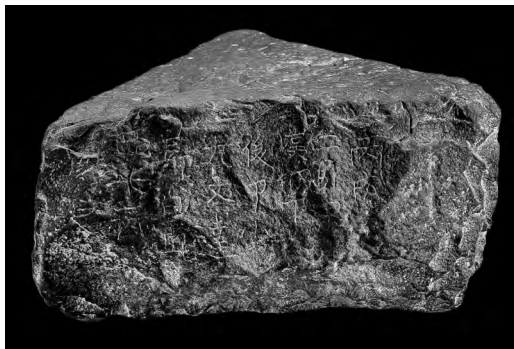
平壤城刻石第一石，刘喜海的《海东金石苑》卷一收录两件（即平壤城刻石第一石和第二石），在这件拓片后，金正喜题跋：此刻出于丙戌，今六十四年，不可复觅。此己丑，当为长寿王后一千三百八十一年，金正喜书。此处丙戌年当为1766年，今六十四年即1829年，说明最晚在1829年这件刻石已经亡佚。目前关于第一石的发现地点还没有准确的说法，因此我们认为需要进一步研究。

平壤城刻石第三石，应是与第二石一起发现的，地点应为平壤外城乌滩下，吴庆锡《三韩金石录》引《平壤志》：纯庙己丑，大涨，九叠城溃决，而出二志石。一石有己丑三月廿一日自此向东下二里内中百头上位使尔伐节二十七字。发现时间应与第二石相同，即1829年。

平壤城刻石第四石（图三），日本学者浅见伦太郎较早撰文介绍此石^[6]，即1913年在改修平壤牡丹台下道路时在城墙中发现，《朝鲜金石总览》记为：大正二年平壤府镜齐里大同江边城墙中发现，即今平壤内城东壁的玉流桥附近。这件刻石目前收藏在朝鲜中央历史博物馆，保存完好。

平壤城刻石第五石（图四），根据朝鲜学者崔羲林^[7]介绍，此石1964年发现于平壤市中区南门洞的静海门南侧150米处（平壤内城南城墙），后来取出，1978年又砌入原来位置。目前仍在城墙中，保存完好，位于今朝鲜平壤人民大学习堂的后面。

平壤城刻石第六石，朝鲜时代学者尹游在1830年编写的《平壤续志》卷一《城池》“北城”条中记述：1714年监司闵镇远在修筑北城时在旧城中发现了这件刻石，即



图三 平壤城刻石第四石



图四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平壤城刻石第五石拓片

现 16 座城门，其中外城与中城、中城与内城之间的共用城墙上各有两座城门^[8]。大型建筑遗址多集中在内城的万寿台一带，1935 年曾发现东北—西南走向长 36、宽 4 米的大型建筑址和门址^[9]，经考证认为是守护宫城北面的兵营址^[10]。

平壤城刻石的内容包括修建时间、负责人、修建距离、完工时间等，对于探索平壤城的修建过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中小兄为高句丽官名，《北史》卷九十四《高丽传》^[11]：“高句丽，其先出夫余……官有大对卢、太大兄、大兄、小兄、竟侯奢、乌拙、太大使者、大使者、小使者、褥奢、翳属、仙人，凡十二等，分掌内外事。”实际上，“兄”应该是高句丽王之宗族、五部中的贵族子弟能担任的官职^[12]。丸都山城宫殿址曾发现多例刻有“小兄”铭文的筒瓦^[13]，推测当时“小兄”这样的官员应该参与了高句丽丸都山城及宫殿建筑的修建活动。第一石、第二石、第四石、第五石中分别出现了小兄相夫若侔利、物苟小兄俳须、汉城下后部小兄文达节、小兄加群，小兄后面的相夫若侔利、俳须、文达节、加群可以看做小兄的姓名。第四石的汉城下后部小兄，可能是居住在汉城地区来自高句丽后部（绝奴部）^[14]的小兄。第三石的上位使即上位使者，《新唐书》^[15]《通典》^[16]等文献中均有记载。唐朝时高句丽官员由吐粹、古邹加（或大加）、上位使者，小兄等十七等官位构成，上述官员组成主要由五部贵族和非五部贵族构成，同时高句丽官僚体系进一步扩大了以太大兄、皂衣头大兄、大兄、小兄为核心的兄系官位群和大夫使者、大使者、拔位使者、上位使者、小使者为核心的使者系官位群，其中上位使者属于正六品，小兄属于正七品。^[17]第二石、第三石均出现了百头，由于文献没有百头的相关记载，因此对于这一职位我们并不熟悉，但是可以认为第三石的内部百头应是来自内部（即桂娄部）的百头，从铭文中百头的位置位于小兄之后（第二石）、上位使之前（第三石）的情况来看，百头的职位可能介于小兄（正七品）和上位使者（正六品）之间。而小兄前的物苟、百头前的俳须（第二石），小兄前的卦娄盖切（第五石）我们目前还不清楚究竟是何含义。就其承担的工程量而言，第一石的小兄承担十一里、第二石的小兄和百头承担十二里、第三石的百头和上位使者承担十二里、第五石的小兄承担一里四尺。高句丽一里=640.08 米，1 尺=35.56 厘米，那么第一石的十一里为 7040.88 米，第二石的十二里为 7680.96 米，第三石的十二里为 7680.96 米，第五石的一里四尺为 641.5 米^[18]。

因为第一石、第二石、第三石、第四石分别出现了己丑、己酉、己丑、丙戌的干支纪年，结合高句丽迁都平壤（427 年）及修建平壤（552 年）的文献资料等^[19]，我们可以推测己丑、己酉、丙戌分别为 569、589、566 年。本城四十二年毕役应是指修建完成平壤城花了 42 年的时间，即平壤城的修建从 552 年开始，一直到 593 年结束，中间持续了 42 年^[20]。而 566、569、589 年均在这 42 年之内。

高句丽平壤城刻石一方面清楚了表明了修建城墙的时间、人物和工程量等信息，为我们复原平壤城的修建过程提供了不可多得资料，另一方面从铭文的内容可以看到“物勒工名”的印记，这些应是受到当时中原工官制度影响的结果。

三、清末中国和朝鲜金石学界的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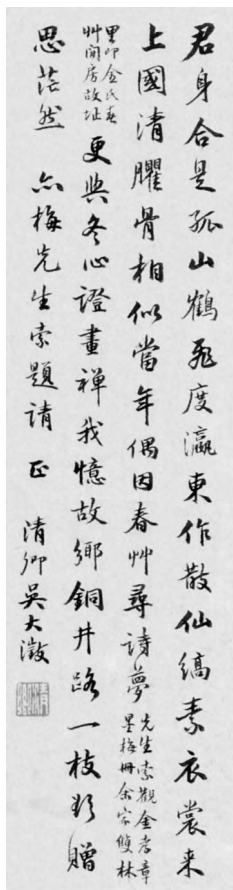
王瓘收藏的高句骊故城刻石拓片来自朝鲜时代著名金石学家吴庆锡，吴庆锡不但与二弟吴庆润、三弟吴庆林、四弟吴庆然皆为当时有名的书法家，而且海州吴氏为朝鲜历史上著名的翻译世家，加上吴庆锡的儿子吴世昌，海州吴氏九代先后十余人为翻译官。吴庆锡曾以译官身份 13 次往来于北京与汉城之间，官至知中枢府事、崇政大夫（从一品）、崇禄大夫（从一品）等。正是因为其独特的译官身份，促使吴氏对于当时的东亚局势非常关注，曾在中国购入当时的维新书籍，如魏源《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寰志略》等带回朝鲜，促进了朝鲜近代史上的开化。因此吴氏也被视为开化党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与刘鸿基（刘大致）、朴珪寿一起被称为朝鲜近代开化思想的鼻祖。吴氏癖好金石、醉心书画，加之当时中国部分金石学家开始搜集朝鲜半岛碑刻拓片等因

素，吴氏与张之洞、吴大澂、王懿荣、潘祖荫等数十人交往密切，是故吴氏所做《墨梅图》^[21]后有刘存仁、张之洞、许贻州、周寿昌、顾肇熙、吴大澂（图六）等人题跋。

清代王昶所编《金石萃编》是较早收集国外金石文字的著作，当时只有朝鲜半岛的《大唐平百济》一碑。随着清末中国与朝鲜金石学界的交往，出现了一大批热衷于此的两国学者，如朝鲜的金正喜、赵寅永、金山泉、李尚迪等，中国方面则以刘喜海、翁方纲父子等为代表，其中刘喜海编写的《海东金石苑》、翁氏父子的《海东金石零记》等成为这一交往的结晶。

金正喜（1786~1856年），字元春，号秋史、阮堂、礼堂，朝鲜金石学家、书法家、诗人。生于忠清南道礼山郡一个贵族家庭。1809年随其任冬至副使的父亲金敬鲁到北京，与清朝著名学者翁方纲、阮元等多有交往。官至成均馆大司成、兵曹参判等职。他在金石学、书法、汉诗等方面均有较深的造诣，其书法苍劲有力，被称为“秋史体”。著有金石学著作《礼堂金石过眼录》等。

刘喜海（1879~1852年），字吉甫，号燕庭，又作燕亭、砚庭，别号三巴子，室名嘉荫蓀、味经书屋、十七树梅花山馆、来凤堂等，山东诸城（今山东省高密市）人，清代金石学家、古泉学家、藏书家，官至四川按察使、浙江布政使。刘氏一族为山东望族，其中刘墉为其祖上，刘氏秉承家学，醉迷金石，著有《海东金石苑》《三巴金石苑》等。朝鲜学者李尚迪为刘喜海的《海东金石苑》做序诗，盛赞刘氏，而刘喜海也深知此书的完成与朝



图六 吴庆锡
《墨梅图》吴大澂
题跋

鲜学者的帮助是分不开的，因此感言：爰有云石赵君，竹林继美；山泉金子，棠棣齐名。学富缥緲，谊敦縞纈，雅慕中华之教，欲观上国之光。鸭水春寒，凤城晓霁。邮程揽胜，历尽万二千峰；石墨凝香，携来百三十卷。相逢倾盖，文字结于奇缘；持赠探囊，金石投夫雅契。其中云石赵君即赵寅永（1782~1850年），名寅永，字义卿，号云石，祖籍丰壤（今韩国京畿道扬州市），丰壤赵氏政治势力的核心人物之一，官至领议政（正一品），谥号“文肃”，有《云石遗稿》等传世。1815年，赵寅永随其堂兄冬至副使赵钟永出使中国，次年春赵氏与北京琉璃厂结识刘喜海，在刘氏编写《海东金石苑》的过程，赵云石曾将古碑拓本数十种赠给刘喜海、并将九十七通朝鲜碑刻的目录抄送给刘喜海。刘氏也曾感叹：云石，博雅士也，赠余墨本甚夥……非云石，何能使余搜罗如是之广也！竹林继美即赵秉龟（1801~1845年），字景宝，号游荷，赵寅永的侄子，丰壤赵氏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之一，官至吏曹判书，谥号“文肃”，好金石，与刘喜海交往密切。山泉金子，即金山泉，因刘喜海的邀请，曾搜集朝鲜金石拓片及朝鲜古书目录等寄给刘喜海。棠棣齐名即金正喜，为金山泉胞兄，全力支持刘喜海的金石搜集工作，曾将新罗真兴王巡守碑拓片和平壤城刻石的第二石拓片等寄赠刘喜海，其中寄赠平壤城刻石第二石拓片的事情，吴世昌藏平壤城刻石第二石的墨拓跋文中曾有提及。而《海东金石苑》中收录年代最早的碑刻就是“高句丽故城石刻”。

本文所提及的王瓘藏高句骊故城刻石拓片可以看作是当时中国和朝鲜金石学术界交流的一个侧面，王瓘除了收藏了这张来自吴庆锡的平壤城刻石拓片外，还藏有一件《新罗真兴王定界残碑》的拓片^[22]（笔者将另外讨论）。通过相互交流，中国学者获得了一批朝鲜半岛早期的石刻资料，尤其是统一新罗时代的碑刻资料，对于研究唐朝与统一新罗的关系提供了新的佐证。朝鲜学者不但获得了来自中国的金石拓片，而且得到维新著作如《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传统经典如《皇清经解》等，对于他们了解中国古代社会、促进朝鲜社会的开化和进步提供了动力，更重要的是促进了中国和朝鲜半岛的人文交流及朝鲜半岛社会的进步。

注 释

- [1] 仲威. 纸上金石——小品善拓过眼录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7: 248-249.
- [2] 关于平壤城刻石铭文, 释读很多, 见申載洪, 金基哲, 閔德植. 韓國古代金石資料集 I——고구려·백제·낙랑 [M]. 首尔: 國史編纂委員會, 1995. 此处释文主要参考该书.
- [3] 刘喜海. 海东金石苑 [M]. 上海: 上海古籍书店, 1964. 本文所引《海东金石苑》内容均出自该书.
- [4] 예술의전당 전시사업본부 서예부. 葦滄吳世昌: 亦梅·葦滄 兩世의 學問과 藝術世界 [M]. 서울: 예술의전당, 1996. 平壤城刻石墨拓本见该书第 130~132 页, 双钩本见该书第 126 页.
- [5] 朝鮮總督府. 朝鮮金石總覽(上) [M]. 漢城: 朝鮮總督府, 1919: 12.
- [6] 淺見倫太郎. 大同江岸發見の高句麗故城石刻 [J]. 朝鮮及滿洲 83, 1914. 本文第四石照片(本

- 文图三), 采自국립중앙박물관. 북녘의 문화유산 [M]. 서울: 국립중앙박물관, 2006: 81.
- [7] 최희림. 평양성에 대하여 [J]. 고고미술, 1966 (2). 本文第五石拓片 (本文图四), 系笔者拍摄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展厅.
- [8] 《조선유적유물도감》편찬위원회. 조선유적유물도감 3·고구려편 (1) [M]. 평양: 외국문중합출판사, 1989. 关于平壤城城门的数量, 目前有 16 座, 平壤城在高句丽修建完成之后, 高丽、朝鲜时代一直沿用, 做过发掘的仅有普通门、正阳门和七星门, 因此对于高句丽时期的城门数量也是学界公认的一道难题. 1935 年日本学者在万寿台“发掘”的一座城门址可能是一座建筑的门址, 见王志刚. 高句丽王城及相关遗迹研究 [D]. 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6.
- [9] 小泉顯夫. 平壤萬壽臺及其附近の建築物址 [A]. 昭和十二年度古蹟調査報告 [C]. 漢城: 朝鮮總督府, 1938.
- [10] 朴灿奎. 平壤地区高句丽都城遗迹 [M]. 香港: 香港亚洲出版社, 2015. 本文图五采自该书第 5 页, 略有改动.
- [11] (唐) 李延寿. 北史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3110-3115.
- [12] 高福顺. 高句丽中央官职研究 [M].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5: 157.
- [13]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集安市博物馆 (编著). 丸都山城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4.
- [14] (宋) 欧阳修, 宋祁. 新唐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6186. 其载: “(高句丽) 分五部: 曰内部, 即汉桂娄部也, 亦号黄部; 曰北部, 即绝奴部也, 或号后部; 曰东部, 即顺奴部也, 或曰左部; 曰南部, 即灌奴部也, 亦号前部; 曰西部, 即消奴部也。”
- [15] (宋) 欧阳修, 宋祁. 新唐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6186. 其载: “(高句丽) 官凡十二级: 曰大对卢, 或曰吐粹; 曰郁折, 主图薄者; 曰太大使者; 曰帛衣头大兄, 所谓皂衣者, 先人也, 秉国政, 三岁一易, 善职则否, 凡代日, 有不服则相攻, 王为闭宫守, 胜者听为之; 曰大使者; 曰大兄; 曰上位使者; 曰诸兄; 曰小使者; 曰过节; 曰先人; 曰古邹大加。”
- [16] (唐) 杜佑. 通典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5014-5015. 其载: “(高句丽) 其国建官有九等. 其一曰吐粹, 旧名大对卢, 总知国事; 次曰太大使者; 次郁折, 华言主薄; 次太大夫使者; 次皂衣头大兄, 东夷相传所谓皂衣先人者也. 以前五官掌机密, 谋政事, 征发兵马, 选授官爵. 次大使者, 次大兄, 次收位使者, 次上位使者, 次小兄, 次诸兄, 次过节, 次不过节, 次先人. 又有状古邹加, 掌宾客, 比鸿胪卿, 以大夫使者为之. 又有国子博士、大学博士、舍人、通事、典书客, 皆以小兄以上为之。”
- [17] 高福顺. 高句丽中央官位等级制度的演变 [J]. 史学集刊, 2006 (5).
- [18] 閔德植. 高句麗의 平壤城刻字城石에 관한 研究 [J]. 韓國上古史學報, 1993 (13).
- [19] 金富轼 (原著), 孙文范等 (校勘). 三国史记 [M].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3: 239, 241. 其载: “八年 (552 年) 筑长安城……二十八年 (586), 移都长安城。” 本文征引三国史记均采自此版本.
- [20] 田中俊明. 高句麗长安城城壁石刻の基礎的研究 [J]. 史林, 1985, 68 (4).

- [21] 예술의전당 전시사업본부 서예부. 葦滄吳世昌: 亦梅·葦滄 兩世의 學問과 藝術世界 [M]. 서울: 예술의전당, 1996. 吳庆錫《墨梅图》见该书第 176 ~ 177 页, 吳大澂题跋见该书第 179 页.
- [22] 仲威. 纸上金石——小品善拓过眼录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7: 250-253.

Study on Rubbing of Koguryo Pyongyang Engraved Stone Collected by Wang Guan

WANG Fei-feng

Rubbing of Koguryo Pyongyang engraved stone collected by Wang Guan is rare rubbing about Koguryo Pyongyang engraved stone in China. Until now, we found similar engraved stone are 6 stones in Pyongyang, this rubbing is the second engraved stone's rubbing, maybe flow into China through Wu Qingxi who Famous Korean epigrapher. Inscription engraved stone contains years, Koguryo official and build city and so on, for the research of Gaogouli capital changes are rare and official materials. At the same time the rubbing has important value for study on contact between China epigraphs and Korean epigraphs in late Qing Dynasty.